

中 | 华 | 经 | 典 | 名 | 著
全 本 全 注 全 译 丛 书

晏子春秋

汤化 译注



中華書局

中华
经典
名著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汤 化◎译注

晏子春秋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晏子春秋/汤化译注. —2 版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
2015.5

(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)

ISBN 978 - 7 - 101 - 10966 - 5

I. 晏… II. 汤… III. ①先秦哲学②《晏子春秋》-
译文③《晏子春秋》-注释 IV. B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93884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晏子春秋 |
| 译 注 者 | 汤 化 |
| 丛 书 名 |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|
| 责任编辑 | 刘胜利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|
| 版 次 |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2015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
2015 年 5 月北京第 5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张 18 $\frac{3}{4}$ 字数 250 千字 |
| 印 数 | 22001 - 25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 - 7 - 101 - 10966 - 5 |
| 定 价 | 45.00 元 |
-

前 言

晏子，名婴，字平仲，一说字仲，谥平，春秋后期齐国人。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：“晏平仲婴者，莱之夷维人也。”夷维即今山东高密。晏子之父名晏弱，谥桓子，为齐卿。公元前556年晏弱卒，此后晏子继任齐卿。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：“[齐景公]四十八年，与鲁定公好会夹谷，……是岁，晏婴卒。”据此，则晏子卒于公元前500年，先后相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三君，长达半个多世纪，其中主要在景公时。以当时齐国局势，大夫专权，田氏势强，景公以昏庸之君，能维持近六十年的统治，齐国还能处于相对强势地位，完全是有赖于晏子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辅佐。他的事迹或传说，除了这部《晏子春秋》外，在先秦两汉其他典籍如《左传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论衡》、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孔丛子》等中也有大量生动的记载，所以司马迁曰：“假令晏子而在，余虽为之执鞭，所忻慕焉。”其崇敬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《晏子春秋》这部书，司马迁就看过。他在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的“太史公曰”中说：“吾读管氏《牧民》……及《晏子春秋》，详哉其言之也。……至其书，世多有之。”西汉成帝时，刘向奉旨领校“中秘书”，即对当时皇室内府的藏书进行整理。刘向校书，并作《叙录》，其中就有《晏子》。他在《晏子叙录》中说：“臣向言：所校中书《晏子》十一篇，臣向谨与长社尉臣

参校讎，太史书五篇，臣向书一篇，参书十三篇。凡中外书三十篇，为八百三十八章，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，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。”《叙录》是刘向向皇帝汇报他校书情况的奏章，这里就是汇报了当时他所见到的《晏子春秋》的各种版本和他整理校定的过程和结果。从中可见，当时刘向所见到的关于晏子的书，就有多种版本，黄以周认为，所谓“中书”，当即皇家禁中秘书；所谓“外书”，即有别于“中书”的其他藏书。司马迁所看到的，可能就是汉太史所藏的五篇“太史书”。这些版本，篇章或多或少，内容文字或同或异。此外，可能还有许多散藏在私人手中尚未进入秘府而刘向所未见到的。1972年，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发掘出近五千枚西汉武帝时期的竹简，经专家整理，其中就有《晏子》十六章（一百零二枚竹简），这个本子是否也在刘向所见的“中外书三十篇”之列，不得而知。由此可见，此书至少在西汉初就已流传，司马迁“世多有之”之说是可信的。刘向的《叙录》由其子刘歆汇为《别录》，并在此基础上作《七略》；东汉班固以《七略》为蓝本，作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在其中“诸子略”的儒家类之首著录了这本书：“《晏子》八篇。”此后，历代目录学著作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中兴书目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、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等均有著录，书名均为“晏子春秋”，有的明言“晏婴撰”，有的不题撰人，卷（篇）数则或七或十二。

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令人关注的问题：书名到底是《晏子》还是《晏子春秋》？共有几篇？属于哪一家？作者是谁？成书于什么时候？等等。对于这些问题，前贤今人作了大量的研究，这里无暇备述，只能简要谈谈笔者在这些研究成果启发下的一管之见。

先秦典籍的编撰成书，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，由明确的一人或数人编写，然后杀青定稿、署名出版。战国之前，私人著述尚未形成风气，古书的形成，往往有个复杂的过程。先是有些原始记录素材，积累渐多，逐渐流传，流传中有人略加整理润色，还会不断有所增加或丢失，如此

几经增损编订，逐渐形成，因此许多典籍难以确定编撰者。比如《论语》，在孔子生前，“时人弟子各有所记”，孔子死后，再传弟子后学门人也还有许多间接记录，如此积累多了，慢慢汇集成书。有些书还由于流传途径、传授流派多种，会出现各种版本，到最后，各种版本逐渐汇集，才慢慢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样子。《晏子春秋》的形成，当亦如此。我国自古有史官传统，所谓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”。晏子作为一代名相，其言行齐国史官必有记录，民间也必然广为传颂，更有好事者踵事增华，“小说家者流”添枝加叶，所以书中所记，常有与史实不合之处，只是类似于后代的包拯、海瑞式的半是历史传记半是故事传说的东西，可当故事看，难作史料信。由于传播广泛，就可能甲地流传五十则，乙地流传八十则，而丙地则流传二百则，分别有人搜集汇编，于是就出现刘向所见到的各种版本。从其中的思想内容以及好对称、多排比等行文风格看，这些过程多半在战国时期。蒋伯潜说：“按此书非晏子自著，乃后人采其行事，记其言论，纂辑而成，其成书实在战国之世。”指的就是这些。但这些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成书”。秦火之后，汉初废除“挟书律”，文禁开放，民间献书，各种私藏禁书重见天日，汇集到朝廷秘府，但版本纷繁简牍错乱，所以才有刘向校书之举。《晏子春秋》经刘向集其大成，校核修订，这才算是“成书”了。

如果上述情况大致无误的话，那么前面提出的那些问题就不难解决了。关于作者，已如前论，至于有些著录称“晏婴撰”，这显然是不对的。书中始终称“晏子”、“景公”，而我们知道，“晏子”是别人对他的尊称，晏子不会自称“子”；“景公”是谥号，晏子死于景公之前，他根本不知道有此称呼。更何况，书中还记有若干晏子死后之事。这些都证明该书不是晏子本人所撰写。关于书名，古人著书，于书名素不甚讲究。例如《诗经》，原无定名，或称“诗”，或称“三百篇”；司马迁忍辱著书，精思巧构，意欲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”，却没想到为这部呕心沥血的传世巨著起个吸引眼球的书名，故世人通称“太史公书”。《晏子》一书，在

当时就不大可能有统一固定的名称,既记载晏子言行,人们或将它类同诸子如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荀子》等姑以“晏子”称之。至于“春秋”,原为编年史的通名,但也不尽然,如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李氏春秋》、《虞氏春秋》等等,均为记载个人言行之书,也称“春秋”,《晏子春秋》当属此类。所以司马迁谓之“晏子春秋”,而刘向、班固则谓之“晏子”。至于篇数,刘向整理为八篇,认为其中六篇合于六经之义,“又有复重,文辞颇异,不复遗失,复列以为一篇;又有颇不合经术,似非晏子言,疑后世辩士所为者,亦不敢失,复以为一篇”。后人在传抄中,或根据个人理解,将这些篇目或合并删减,或拆分上下,遂有多种篇目版本。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本子,就是八篇(卷)二百一十五章,与刘向所言相同。

但有人认为,司马迁、刘向、班固所见的《晏子春秋》(或《晏子》),早已亡佚,现有的《晏子春秋》,是后人采掇晏子的事迹,依照刘向《叙录》所言体例伪作的,甚至怀疑是六朝人所为。持这种观点的,主要从书中所载之事推断。如讥讽晏子“三心”问题,今本《晏子春秋》的《问下》第二十九章记为梁丘据,《重而异者》第十九章记为高子,而《不合经术者》第三、四章又记为孔子。又如关于齐景公修路寝占人墓地问题,《谏下》第二十章记为逢于何,而《重而异者》第十一章则记为盆成适。再如今本《不合经术者》第四章记孔子到齐国,晏子讥孔子遭桓魋追杀、困于陈蔡之事,而史载此事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时,此时晏子已死。还有一条根据是,司马迁在《管晏列传》中说:“其书,世多有之,是以不论,论其轶事”,所以在管仲的本传中载了一条《管子》中所没有的管仲论与鲍叔牙之交的“轶事”;以此推断,在晏子的本传中所载的关于赎越石父和荐御者为大夫的“轶事”,应当也是《晏子春秋》中所没有的,可是在今本《晏子春秋》中,这两条“轶事”都有,可见今本《晏子春秋》是司马迁所没见到的。这些问题,其实也不难理解。从上述该书产生、传播的情况看,既然有各种不同版本,同一件事情,出现事实有出入、人物各不同的现

象,就都是极为正常的。这种现象即便在传播十分先进发达的现代社会,也还经常发生。且不说《晏子春秋》不是正式的史书,即使如《史记》这样的权威典籍,同一部书中,同一件事情,人物、地点、时间等有出入,也不乏其例。如关于孔子离鲁适卫的时间,《史记》中就有三说:《鲁世家》与《十二诸侯年表·鲁》为鲁定公十二年,《卫世家》与《十二诸侯年表·卫》为鲁定公十三年,而《孔子世家》则为鲁定公十四年。出自同一人之手的权威史著尚且如此,又何必计较传说版本众多的《晏子春秋》呢?再说,即使真有三个人都讥讽过晏子有“三心”、齐景公修宫殿占了两个人的墓地,也不是不可能的。相反,这种同一事件“版本”不同的情况,正可证明是当时各种传说所记;如果是后人伪作,反倒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。尤其是关于孔子陈蔡之事,早有史书明确记载,后人如要伪作,更不可能记成在晏子生前。而关于司马迁的“轶事”问题,如前所论,他所看到的只是众多版本中的一种,其中可能就没有赎越石父和荐御者为大夫之事,所以他视为“轶事”。当然也可能这两则是后人增补的。《晏子春秋》虽经刘向整理修订,但是当时既没有如今天这样的印刷术,也没有像“石经”那样不可改动的官定权威版本,《晏子春秋》即便成书,此后也依然全靠手抄转写流传,其间附益删改、分合挪动,也在所难免,但基本上大局已定,断不至于面目全非。依据法律“无罪推定”原理,若无确凿证据,仅凭个别内容有出入,就断定原书已佚、今本为后人伪作,缺乏说服力,难以成论。至于认为作伪者为六朝人的说法,更不见任何根据,只凭“词气”不如、“其文浅薄过甚”之类随便怀疑,更是浅薄之论,不足为信。

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晏子春秋》列为儒家之首,则认为此书体现的是儒家思想。唐代柳宗元则认为当属墨家。他在《辩〈晏子春秋〉》中说:“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。墨好俭,晏子以俭名于世,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。且其旨多尚同、兼爱、非乐、节用、非厚葬久丧者,是皆出墨子,又非孔子,好言鬼事,非儒、明鬼,又出墨子,其言问

枣及古冶子等，尤怪诞，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，此甚显白者。……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，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。后之录诸子之书者，宜列之墨家。非晏子为墨也，为是书者，墨之道也。”此后，属儒属墨，争辩不休。还有人主张列入小说家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则将其列入史部传记类。这些说法固然都有一定道理，但也都有片面性。我们先说历史上的晏子。关于先秦学术“九流十家”之说，是汉代司马谈、刘歆的总结，刘歆、班固在著录先秦典籍时，遂将各书分别纳入既定的“九流十家”框架中。其实，这些诸子流派，在先秦并非骤然形成、壁垒分明。晏子生活在春秋后期，比孔子还略早些，那时，各家思想都只是开始萌芽，尚未形成明显的界限，有些主张，各家共有，有些差别之处，也往往互相影响，互相渗透。所以那时人们的一些言论主张，同时带有后来各家的色彩，是很正常的。而晏子，从他的生平活动看，一生相齐，从事的是十分具体的辅佐君王、治理齐国的政治、外交活动，是个杰出的政治家。政治家与思想家不同。思想家如孔子孟子，不事实务，毕生追求远大的理想，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所以他们在政治上往往失败，思想则成为政治家的工具；而政治家，讲求实际、崇尚功利，善于把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化为治国安邦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，而工具，是不拘一格的，不管哪家哪派，有利则用，无利则否，杂各家之道而用之，那么他们某些主张或行为与各家思想有共同之处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再说《晏子春秋》。书中的晏子，又不等同于历史上真实的晏子。书中的晏子，如主张爱护百姓，重视民心，廉洁节俭，减赋省刑，任贤用能等等，应当说是各家共有的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开明进步的人们的共同愿望。战国之时，儒、墨两家同为“显学”，势力较强。对于晏子这样一位人人称颂的贤相名臣，谁都乐于和他“沾亲带故”，因此在传颂时也自然会有意无意地强化其本学派的色彩，于是有些篇章中就带有较为明显的儒家或墨家倾向，引用孔子或墨子称颂的话，这正是本书的形成过程与性质使然，不宜单凭某些内容就认为属于哪一家。

今本《晏子春秋》一书，共八卷，分为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。内篇即刘向所谓“合于六经之义”者，有六卷：谏上、谏下、问上、问下、杂上、杂下；外篇即刘向所谓“颇不合经术，似非晏子言，疑后世辩士所为者”，共两卷：重而异者、不合经术者。全书共二百一十五章，各章长者数百字，短者几十字。这些篇章，既有历史上真实的晏子的言论事迹，又杂合了大量民间传说，记载了人们心目中的晏子的思想言行，塑造了晏子这位正直贤明、堪称楷模的杰出政治家的形象。

书中晏子表达的政治主张主要有：

重民爱民。自商末周初以来，人们就逐渐认识到“民”对于“天下”的重要性。所谓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（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），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（《国语·周语上》），乃至孟子的千古名言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，这种“民本”思想越来越成为进步思想家、政治家的共识。这种思想贯穿在《晏子春秋》整部书中，不但体现在绝大部分篇幅里，而且还是其他思想内容的出发点。他和晋国的叔向交谈中，说道：“意莫高于爱民，行莫厚于乐民。”“意莫下于刻民，行莫贱于害身也。”（问下第二十二）因此他主张“先民而后身”（问下第四）。当一位老人祝愿“使君无得罪于民”而引起齐景公不快时，晏子谏道：如果君主有罪于百姓，将有谁来治呢？我斗胆问一句，夏桀、商纣王，是被君主杀的呢？还是被百姓杀的呢？（谏上第十三）

先秦民本思想，还有一个重要特征，即把“民心”与“天意”联系起来，即所谓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（《尚书·秦誓中》），“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”（《尚书·秦誓下》）。当然，这个“民”的概念是有特定的时代政治内涵的，但随着社会的变革，民本思想的逐渐深入人心，到了晏子的时代，它基本上是指广大的平民百姓了。《晏子春秋》有几处记载齐景公想通过祭祀祈祷去祸消灾，晏子都劝谏他要重在得人心，鬼神才保佑，否则祈祷是无用的。如有一次，景公久病不愈，怪罪于祝祷者，想杀了他们以取悦上帝，晏子借题发挥，指出如果祝祷有益，那么诅咒

也必然有损，景公的一贯昏庸残暴行为，已招致天怒人怨，如今举国上下，“此其民众矣，百姓之咎怨诽谤、诅君于上帝者多矣。一国诅，两人祝，虽善祝者不能胜也。……上帝神，则不可欺；上帝不神，祝亦无益”（谏上第十二）。说得合情合理，令景公心悦诚服。当然这并不是说晏子完全不信天命鬼神，而是他能把民心放在天意之上，规劝统治者重视民心，这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。

作为政治家，这种重民爱民思想当然要体现在具体措施上。春秋末世，统治者穷奢极欲而横征暴敛、征役无度，是普遍的现象。齐景公生活奢华，宴饮无度，还多次大兴土木，修建豪华官室，沉重的赋税徭役，使老百姓不堪重负，更逢天灾，野有饿殍，道有乞儿。晏子经常对景公直言劝谏，告诫他：“不以饮食之辟害民之财，不以宫室之侈劳人之力；节取于民，而普施之；府无藏，仓无粟。”（问上第七）并警告景公：如果“厚藉敛于百姓，而不以分馁民”，最终会导致“百姓必进自份也”。（谏下第十九）有一年，齐国连日大雨成灾，“百姓老弱，冻寒不得短褐，饥饿不得糟糠，敝撤无走，四顾无告”。而景公却只顾个人享乐，到处招募歌手，不体恤百姓。晏子一方面拿出自己家中的粮食车具捐助百姓，一方面对景公语重心长，陈情劝谏，并揽过自责。说服了景公后，又细致具体地安排、落实赈灾事宜。（谏上第五）晏子还主张轻罚省刑，反对滥杀无辜。齐景公好施刑罚，动辄杀人，他心爱的槐树被人碰伤了，竹子被人砍了，捉的鸟被人吓飞了，工程未能如期完成，等等，他都要杀人，以至于“拘者满圉，怨者满朝”（谏下第一），晏子每每极力劝谏，指出：“穷民财力以供嗜欲谓之暴，崇玩好、威严拟乎君谓之逆，刑杀不称谓之贼。此三者，守国之大殃也。”（谏下第二）告诫景公应当“刻上而饶下，赦过而救穷；不因喜以加赏，不因怒以加罚”（问上第十七）。有一次，他与景公因换房问题谈到市场物价，借题发挥，针对景公滥施酷刑，许多人被砍了脚的情况，告诉景公，现在市面上鞋子便宜，而假腿很贵，于是“晏子一言，而齐侯省刑”（杂下第二十一）。

以礼治国。古人的所谓“礼”，简单说来，就是用以调节社会矛盾，维护宗法制度、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、典章制度。任何一个社会，都需要有相对稳定的秩序，因此也就需要有一套相对稳定的伦理规范、典章制度来维护社会的稳定，否则社会就会混乱无序，治理成本就要大大增加。但由于其稳定性，也必然在某些问题上显示出不合理，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时，它的稳定性就会制约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，于是这个“礼”就需要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作相应的调整。所以孔子说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可见他对于传统礼制，既主张继承，反对彻底砸烂；也主张发展，反对一成不变。而他与晏子生活的时代，正是“礼崩乐坏”的大变革时期。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，其进步性毋庸置疑。但也因此带来了新的社会失衡，新的矛盾激化，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。从春秋到战国，列国兼并愈演愈烈，把百姓拖进深重的战争苦难中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至于那些以变革为名，摆脱传统礼制的约束，制造混乱，为所欲为，祸国殃民，则在任何时代都是逆流，与变革毫不沾边。所以孔子对“礼崩乐坏”痛心疾首，向往礼治仁政，固然有一定的保守性，但并非要“开历史倒车”，回到西周时代；而是强调稳定有序，把“仁”的精神体现在“礼”的制度中，推广到天下百姓身上。这虽然在当时无法实现，但体现了一种崇高博大的仁者胸怀。晏子是政治家，不能与孔子相比，但他的以礼治国的主张，与孔子思想是相通的。他经常以齐国的前辈明君贤相齐桓公、管仲的事迹教育景公，但对他们的某些行为也每有微词。当时齐国正面临“田氏代齐”的局面，但他并未对田氏大张挞伐，而是冷静理智地分析了田氏施惠于民、深得人心和公室骄横暴虐、民怨沸腾的事实，指出：“今公室骄暴，而田氏慈惠，其爱之如父母，而归之如流水，欲无获民，将焉避之？”（问下第十七）由此可见，他对于田氏的所作所为，理智上还是赞许的。当然，以其大夫的贵族身份和相国的职业道德，他也希望姜氏公室不被取代，因此当景公问他“奈何”时，他说：

“维礼可以已之。”并说：“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，与天地并立。君令臣忠，父慈子孝，兄爱弟敬，夫和妻柔，姑慈妇听，礼之经也。君令而不违，臣忠而不二，父慈而教，子孝而箴，兄爱而友，弟敬而顺，夫和而义，妻柔而贞，姑慈而从，妇听而婉，礼之质也。”（重而异第十五）似乎他在维护旧礼制，想以礼来限制田氏，以维护公室统治，但这是有前提的。他希望景公能重民爱民，减少赋税，轻罚省刑，施惠于民，田氏能做到的，景公也做到了，苟如是，对于齐国、百姓来说，于姜氏田氏何择焉？如果再加上这些礼治措施和结果，岂不是比田氏更高明吗？当然，他深知这些不能实现，所以他多次明确表示，田氏代齐，已是大势所趋，无可挽回。这正是他作为政治家的开明进步之处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以政治家的务实执著精神，处处坚持以礼治事，以礼治国。齐庄公崇尚勇力，不行礼义，导致勇力之士，横行无忌，晏子则指出，勇力必须以礼义为前提，否则将导致国家衰败灭亡。（谏上第一）齐景公豢养了三位勇士，但他们勇力无比却不知礼义，晏子认为这种人是国家的祸害，必须设计除掉。（谏下第二十四）齐景公厌倦了礼的约束，想在饮酒时放松一下，让群臣不拘礼节；而晏子则视礼为大事，劝谏景公：“君之言过矣！群臣固欲君之无礼也。力多足以胜其长，勇多足以弑其君，而礼不使也。禽兽以力为政，强者犯弱，故日易主，今君去礼，则是禽兽也。……礼，不可无也。”可是景公不听，于是晏子有意对景公无礼，让景公亲自体验一下君臣无礼的后果。（谏上第二）甚至在行为细节上，如景公在打猎休息时，直接坐在地上，晏子则拔草为席，并劝谏景公不可直接坐地，其实是教育景公，哪怕是在随便的场合、日常小事上，也要依礼而行，不可轻慢忽略。（谏下第九）

任贤去佞。在齐国，当年齐桓公置射钩而以管仲为相，遂成霸业，成为千古佳话。晏子经常以此教育景公，要重用贤人，不要偏爱谄佞之徒。齐景公的宠妾死了，他连日厮守，不让安葬，晏子以“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，嬖乎竖刀而灭”为训，批评景公不该“薄于贤人之礼，而厚

嬖妾之哀”(谏下第二十一)。景公认为桓公也有穷奢极欲、纵酒好色等毛病，晏子告诉他：“昔吾先君桓公，变俗以政，下贤以身。管仲，君之贼也，知其能足以安国济功，故迎之于鲁郊，自御，礼之于庙。异日，君过于康庄，闻宁戚歌，止车而听之，则贤人之风也，举以为大田。先君见贤不留，使能不怠，是以内政则民怀之，征伐则诸侯畏之。”(问下第二)景公打猎看到了虎和蛇，以为不祥，晏子告诉他，国家最大的不祥是：“有贤而不知，一不祥；知而不用，二不祥；用而不任，三不祥也。”(谏下第十)而对于人材，还要善于使用，“地不同生，而任之以一种，责其俱生不可得；人不同能，而任之以一事，不可责遍成”，就是说，对人不能求全责备，而要“任人之长，不强其短，任人之工，不强其拙”。(问上第二十四)一个贤明的国君，“谄谀不迹乎左右，阿党不治乎本朝”(同上)，而昏君最常犯的毛病，恰恰就是偏爱小人，信任谗佞。《晏子春秋》中就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人物梁丘据，景公认为他对自己有求必应，就是“忠且爱我”，因此对他最为宠爱；晏子分析指出，梁丘据的所谓忠和爱，其实是阻塞群臣、蒙蔽君王的小人行为。(谏下第二十二)景公认为梁丘据与自己最“和”，晏子指出，像梁丘据那样，只是“同”，而不是“和”。所谓“和”，就好比是烹调和音乐，不同的味道、不同的声音，相互和谐，才能有美味的食物、美妙的音乐。君臣之间也是这样，求同存异，取长补短，和谐共处。而像梁丘据那样，对景公阿谀奉承，附和苟同，那就是毫无原则的“同”，是不可取的。(重而异第五)对于这样的谗佞小人，晏子形象地比喻为“社鼠猛狗”。土地庙中的老鼠，作恶为祸，人们想要除掉它，但它寄居在神像里，人们投鼠忌器；酒店的酒虽好，但主人家的狗守在门外，谁也不敢靠近。这些谗佞小人就是这样，仗势弄权，为非作歹，蒙蔽君王，但因为有了君王的庇护，谁也奈何不得，因此是国家最大的祸患。(重而异者第十四)

值得重视的是，晏子对国君的批评讽谏，提出的许多主张，自己就是身体力行者。他主张爱民，轻赋省刑，反对穷奢极欲，横征暴敛，自己

也清廉节俭、克己奉公。书中多处描写他饮食粗劣，衣着简朴，车马破旧。景公多次要给他封赏，他表示不以贫困为憾，而以贫困为师，谢绝了景公的封赏；（杂下十七）为乱的大夫庆封逃亡后，人们瓜分了他的财产，也分给晏子一些食邑，晏子不肯接受，他说，人的欲求不能充分满足，富贵要有限度，过于充分、超过限度，就要走向反面，导致灭亡。（杂下十五）他家住房低小潮湿嘈杂，景公要把它换了，他却借题发挥，谈到“踊贵而屦贱”问题，劝谏景公不要滥施酷刑；（杂下二十一）齐景公趁晏子出使时，把他邻居的房子拆了以扩大他的住宅。晏子认为这是侵犯了邻居的利益，坚决不居住，并要求恢复邻居的住宅。（杂下二十二）景公见他上朝时乘坐的是破车劣马，便派梁丘据给他送去豪华的车马。晏子几番推辞，告诉景公，自己是百官之长，如果带头奢侈，就无法禁止下属和百姓中的奢靡现象了。（杂下二十四）当他告老时，坚持要把封邑车马退还朝廷。（杂下二十八）而当齐国连日大雨，百姓饥寒交迫时，他一方面拿出自己家中的粮食车具捐助百姓，一方面对景公陈情劝谏，并揽过自责，又细致具体地安排、落实赈灾事宜。（谏上第五）他身为大国之相，却谦虚谨慎，善于反躬自省。景公要把伤了槐树的平民治罪，民女以甘为小妾为名求见晏子，晏子却从“老而见奔”中觉得其中必有冤屈，亲自过问，劝谏景公宽赦伤槐者。（谏下第二）还有个女子想做晏子的小妾，晏子以此反省，认为自己身负治国重任为民做主，却有女人前来私奔，说明自己一定有好色的表现，行为上有不廉正之处。（不合经术者第十一）至于他日常的举止态度，总是“志念深矣，常有以自下者”，使自以为得志而趾高气扬的车夫也变得谦虚自制。（杂上第二十五）他主张以礼治国，强调君臣大义，任人唯贤，和而不同，在行为上也堪称贤相良臣的楷模。他先后侍奉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，“以一心事三君”，忠心耿耿，但他始终坚持道义原则，不苟合阿从，不愚忠。整部《晏子春秋》，记录的多是他对君王的劝谏告诫、面折廷争的故事，有时甚至一日三谏；即使被罢辞官，“东耕海滨，堂下生藜藿，门外生荆棘”（重而

异者第二十二),也在所不顾。他认为,作为人臣,“君顺怀之,政治归之;不怀暴君之禄,不居乱国之位。君子见兆则退,不与乱国俱灭,不与暴君偕亡”(重而异者第十六)。齐庄公荒淫,为大夫崔杼所杀,晏子认为他不是为国家,而是为私事而死,所以他既不陪死,也不逃亡,也不回家,但还是以礼吊唁了庄公而去。(杂上第二)崔杼杀了庄公后,与另一大夫庆封共同拥立景公,并劫持了齐国的将军大夫,胁迫他们结盟。晏子不畏强暴,宁死不从。(杂上第三)至于他自己用人,也要求对方也和自己一样正直不阿。他有个管家,因为三年从未批评纠正过他的过失,他就把这个管家辞退了。(杂下第二十三)在这方面,书中个别篇章则有些败笔。如《谏下第五》写齐景公趁晏子出使时,大兴土木修建高台。晏子回来后,饮酒悲歌,劝谏景公停止工程;然后故意鞭打责骂民工,把百姓的怨恨引到自己身上,把停止工程之事完全归功于景公,以此树立和维护景公的威望。这就有点“过”了,似乎不像是晏子该有的行为。再如《杂下第七》写晏子为景公抚摩毒疮,并回答景公的问话,说毒疮热得像太阳,颜色像青玉,大小像玉璧,裂开像玉版。作者的意图可能是为了体现晏子的善于应对,言辞美妙,但其内容本身,却活画出一副谗臣的嘴脸,令人作呕。

晏子讽谏应对,善序事理,抓住关键,逻辑严密,分析透彻,故往往使对方唯有称善。如景公说,人要是不死多快乐,晏子说如果这样,那快乐也是古人的,根本轮不到您。(重而异第四)士人逢于何想让亡母与早死的亡父合葬,但亡父之墓在景公殿墙下。景公以自古没有把死人葬在国君宫殿之下为理由,拒绝逢于何的请求;而晏子讽谏景公,那是因为古代君王宫殿很简朴,不侵占百姓的坟地,并趁机批评了景公大兴土木侵害百姓的行为。(谏下第二十)齐国大旱,齐景公想祭祀山神河神以求雨。晏子说,大旱之时,山、河自身更想得到水,祭祀它们有什么用呢?(谏上第十五)还有上文提到的“一心三君”、祝祷无益,等等。他还善于因势利导,借题发挥。齐景公想伐宋,途中梦见两个人,晏子

就趁机把话题扯到宋国的祖先、商代贤君良相商汤和伊尹上去，劝谏景公不要伐宋。（谏上第二十二）景公要给他换房子，他却从房子引到市场，谈到“踊贵而屦贱”，劝景公不要滥施酷刑。（杂下第二十一）晏子有时还善于逆向推理，正话反说。景公饮酒无度，大臣弦章劝谏不听，晏子说：“幸矣！章遇君也。令章遇桀、纣者，章死久矣。”（谏上第四）景公的爱马死了，景公要杀养马人，晏子数落了养马人的三大“罪状”，批评景公重马轻人的不仁之心，并指出这种行为的严重后果。（谏上第二十五）在外交场合，晏子更是从容应对，机智善辩。晏子使楚，楚人欺他矮小，让他从狗洞进去，他说：出使狗国，才从狗洞进出；楚王问他，齐国怎么派您这样的人出使，他答道：因为我最不肖，所以只能出使楚国。（杂下第七）楚王佯称捉到一个在楚国为盗贼的齐国人，想以此羞辱晏子和齐国。晏子以橘、枳为喻，推出“楚之水土使民善盗”的结论，回敬了楚王。（杂下第八）这些应对，不但机智，而且幽默。其他诸如与景公游牛山以许愿娱乐（不合经术者第八）、与景公关于东海之枣的佯问佯答（不合经术者第十三），等等，虽在内容上“不合经术”，但也饶有趣味。

在先秦诸子散文中，《晏子春秋》可谓别具一格。虽然多为对话问答形式，但也略有故事情节，其中晏子和齐景公的形象，尤为鲜明。晏子的廉洁奉公、善序事理、机智幽默，已如上文所言。而齐景公，骄奢淫逸，好大喜功，亲近小人，愚蠢昏庸，但他心地还算善良，又能纳谏，与其他昏君又有所不同；对于晏子的批评讽谏，他每每言听计从又屡教屡犯，就像是一个无知任性的老顽童，令人觉得可恨可悲之余，又有几分可爱之处。书中有些篇章，描写生动，情节性强，人物形象也较鲜明。如著名的“二桃杀三士”，写晏子要除掉三位勇士，便利用他们好强自负又爱面子的弱点，让景公用两个桃子让他们论功吃桃，使他们先后自杀。三勇士论功时，又突出古冶子河中杀鼋的夸耀，绘声绘色，十分精彩。（谏下第二十四）崔杼之祸，先写晏子被齐庄公收回爵禄，他先叹气后笑；崔杼杀了庄公，他先后与随从、崔杼关于死、逃、归的对话；最后写